

甲骨文的隱喻

——評何偉《甲骨文：一次占卜當代中國的旅程》

● 畢 苑

在《甲骨文》中，何偉以訪問者、傾聽者的姿態出現，但並非沒有自己的立場。《甲骨文》融新聞敘述、歷史、文學研究為一體，全書氤氳着一種悠遠、深沉又新鮮的文化氣息。



何偉 (Peter Hessler) 著，盧秋瑩譯：《甲骨文：一次占卜當代中國的旅程》(新北：八旗文化，2011)。

這果真是一個歷史源遠流長的國家嗎？讀畢何偉 (Peter Hessler) 的《甲骨文：一次占卜當代中國的旅程》(*Oracle Bones: 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以下簡稱《甲骨文》，引用只註頁碼)，卻使筆者產生這樣的疑問。

很久以來，一些西方人就是這樣認為：中國的「過去」比西方長，但「過去」並不等於「歷史」，中國歷史只是如壁紙般重複循環(頁7)。或許是這種觀念啟發了何偉，他的興趣就是觀察中國的「過去」和「現在」之間閃爍起伏的邏輯、文化聯繫，也就是說，中國的「過去」以甚麼樣的方式存在於「現在」中？

1999年，二十九歲的何偉是《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北京辦事處的一名剪報員，此後他正式成為駐北京的職業新聞記者。相比之前的外語教師工作，這份工作給了他更多機會接觸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等。這些臉譜是他認識中國的聚焦點，這些人所遭遇的事件、所思考的問題，都是他認識中國的切入點。

何偉有着超卓的導演才能。在《甲骨文》中，他筆下的材料在時間

潮水的推動下起伏湧現，人物輪番登場，故事起落跌宕，敘述絲毫不落匠氣，彷彿一切都是那樣自然發生，彷彿何偉只是一個老實巴交甚至有點瑣碎的記錄者。他以訪問者、傾聽者的姿態出現，但並非沒有自己的立場。正是這種細緻得幾乎看不到作者本人的描述，表達了對考察對象的尊重。在這裏，人類學家吉爾茲 (Clifford Geertz) 所說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 方法和「對理解的理解」(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s) ①得到了完美體現，並展現出影視般的層次和特寫。在表述方式上，《甲骨文》融新聞敘述、歷史、文學研究為一體，這讓此書很難被圈入一個狹隘的分類中；全書氤氳着一種悠遠、深沉又新鮮的文化氣息。

一 多層次的「歷史」

在這本書中，無處不見何偉對中國人歷史觀的興趣。或許，正因為何偉不是一個歷史學者，他才能更灑脫地拋棄那些把紙質記載和存在於記憶中的表象史事視為歷史的想法。

在何偉的觀念中，歷史既包括存在於記憶中的，也包括當事人不想提起、希望遺忘的事情，而後者往往更為關鍵。他敏感地發現，很多不識字的農民，包括他的中國學生威廉的父母，都是1949年前出生的人，他們跟兒孫輩說，最苦的時候是大躍進時期，但對於那時期的生活卻不願多談，彷彿遺忘得愈乾淨愈好。相反，對於文化大革命這個對城市和知識份子階層影響更

大的事件，他們卻願意當作談資，很能講出一些今天看來殘酷黑色的笑話來。何偉看到，農民沒有記錄自己歷史的能力，苦日子就那樣流過去了。官方記錄如果想丟掉這塊歷史，則是很容易的(頁51)。這段描述足讓我們深刻理解為甚麼文革尚能為人所知，而大躍進時期的農民生活狀態在當代歷史研究、在當代人的言說中，卻幾近蒼白。這給歷史學者帶來了一個重要的提示。

還有一種歷史，是人們不能夠公開討論的話題。何偉發現，北京的時間是不穩定的，有時某個時間像是永久，例如國慶紀念日，而某些時間一閃而過就不再重現，例如他試圖尋找的「6月4日」。「有些日子，黨要紀念它；有些日子，黨想把它遺忘。」(頁149)何偉到北京那一年，正是天安門事件十周年。十年來，中國大陸媒體沒有再提起那個事件，而何偉因為工作和個人興趣，想知道中國人對這個事件是否存在看法。書中提到的一個場景是當時一位美聯社 (Associated Press) 記者拍到的：一個中年男人在天安門廣場上打開白傘，傘面上手寫着：「牢記學潮，國產歸還於民」，這場一個人的遊行只進行了幾秒鐘就被撲滅了(頁75)。何偉輪班時，看到的只是圍上了警戒線的廣場，而且，人群中有些人看起來不像遊客：三四十歲、平頭、便宜的短外套，在漫步但並沒有樂在其中——他們不笑、不拍照、不買紀念品，只是徘徊張望，三三兩兩碰頭，手裏報紙捲成筒狀，何偉看到了裏面的黑色對講機。下班後，何偉在一家餃子店吃晚飯。他

在何偉的觀念中，歷史既包括存在於記憶中的，也包括當事人不想提起、希望遺忘的事情，而後者往往更為關鍵。還有一種歷史，是人們不能夠公開討論的話題。

何偉對中國問題的觀察和描述，都指向宏大嚴肅的追問。何偉認為，從大歷史來看，弱小民族和國家似乎只能在大國歷史的長河中滑進滑出，留不下自己的痕迹。

想知道普通民眾對這一天是否還有記憶，便問同桌就餐的三輪車伕今天幾號。車伕茫然，回頭問店老闆。店老闆馬上回答了準確的日期，並交叉兩手食指比成中文的「十」字，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地說：「十周年慶。」(頁76)何偉呈現了面對歷史記憶時官方和民間不同的應對方式。

另外一種歷史，或許是虛假的歷史，但它同樣有存在的空間。何偉有一次到山西太原旅遊，在一個兜售手錶、打火機、菩薩符咒和手工鞋墊等雜貨的小集市上，他看到一個販賣小冊子的男人。出於對「兜售故事的人」的特別親切感，何偉湊了過去。堆在地上的是一些顯然不合法的出版物，鋪着的白布上寫着「誰比較好，毛澤東還是鄧小平」、「一則從沒被報導過的重要新聞」、「世界變得這麼快，二十年後中國還會實行社會主義嗎？」等語句。小販很會吆喝：「只要一元」，「甚麼主題都有，你所要的所有答案都在裏面！」(頁126)何偉覺得，如果在北京，這樣的小販和貨物很可能被趕走和沒收；但是首都以外，各種各樣的謠傳、謎團、小道消息、陰謀論，這些小聲音存留的可能性則大很多，小販可以靠售賣國家控制的媒體漏掉的消息來賺錢(頁127)。

這個分析一半正確，一半並不準確。正確之處在於，如果國家權力嚴格控制媒體，一切信息只在高層小範圍內運作，這種制度運作的不透明必然造成社會運行無序，文化無理性，謠言滿天飛。中國傳統王朝的運作一直如此，即便所謂「盛世」時期也逃不過此例，著名的

美國中國學研究者孔飛力(Philip A. Kuhn)教授對乾隆三十三年(1768)衝擊了大半個中國的「叫魂」案的研究可謂典型範例^②。何偉認為，在當代中國所謂的「新聞傳播」更多是權力掌控下的“Propaganda”，而非媒介自發的“Publicity”。可以說，中國政治文化至今也沒有走出無理性時代(頁128)。只是何偉不了解，北京平民對政治的關心超過(或者不低於)外省市民眾已是眾所周知，小販和小道消息在首都反而擁有更廣泛、更隱秘的存在空間。

二 觀察者的觀察

在筆者看來，《甲骨文》一書記錄、探察之豐富深入，描述、鋪排之巧妙迷人，超過了何偉另外兩部聲名卓著的作品：《尋路中國——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③和《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④。筆者同意何偉所供職的《華爾街日報》對他的評語：「《甲骨文》一書奠定了何偉的地位，使他成為描寫當代中國的最有深度的西方作家之一。」(封底)這些都表現在他對中國問題的觀察和描述中，它們都指向宏大嚴肅的追問。

何偉認為，從大歷史來看，弱小民族和國家似乎只能在大國歷史的長河中滑進滑出，留不下自己的痕迹(頁39)。因為維吾爾人波拉特(何偉在北京最早結識的好朋友，也是他的故事線索貫穿本書)，何偉對新疆問題有了真切的感觸，了解維吾爾民族與中央政府有着深遠

的歷史文化糾葛，知道「新疆」之立名及東突厥斯坦問題的由來。

波拉特是一個普通維吾爾人，他的父親在1940年代曾加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軍隊，為贏得國家民族獨立而與蘇聯、中國等大國鬥爭周旋，最後以失敗告終，其後在文革中被批鬥成了跛子。波拉特希望在真正的「維吾爾族史」中記錄這一筆。

改革開放以來，因為石油天然氣的發現造成漢人移民大量進入，維吾爾族文化原來的平衡狀態明顯改變，原來社會階級中知識份子居於農民和商人之上的層級區別受到影響，民族問題因而升級。維吾爾族知識份子反對中央把發展經濟當做政治工具的利誘和控制手段，同時也為低教育程度的族人與之同流合污而哀嘆怨恨。波拉特正是如此，他繼承了父親反抗的種子，參加過反對漢人移民的遊行，因此遭受牢獄之災而丟失教職。他所希望的就是記錄歷史，尋找自由(頁39)。

最終波拉特來到了他嚮往的自由之地——美國。雖然波拉特在美國生活不易，身份比較「邊緣」，而且他想要把妻子接過去的願望也一波三折，難以實現，但他喜歡這種忙碌的生活，在穿梭的車流中找路送外賣，從心裏享受一種「自由」(頁534)。波拉特的故事讓何偉認識到中國種族之複雜和幅員之遼闊，而波拉特的個人歷史和執著追求，讓我們看到一個小小份子如何從一個龐大的民族國家中出走。這是令人深思的。

眾所周知，「9·11」後穆斯林問題在中國和美國的敏感度或重要性都更加提升。何偉認為，中國當

局在恐怖襲擊後開始提及所謂「東突恐怖份子」——此前稱之為「新疆分離主義者」，這種宣傳口徑的變化是為了贏得美國及國際社會的同情，也更利於中國官方處理民族事務(頁452)。其實波拉特這樣的維吾爾人對塔利班組織更是反感，他的一位朋友直截了當地對何偉說：「我比美國人更恨塔利班人。如果不把塔利班除掉，人們可能會把他們跟維吾爾人聯想在一起，這正是中國人所希望的。他們現在才跳上反恐怖主義戰爭的列車……」(頁451)何偉批評美國中亞政策的模糊造成了塔利班坐大的代價，說到底，中亞民族的真實資訊太少了，他們今天還是被塑造的群體(頁453)。

與波拉特相比，何偉在他的學生身上看到另一種中國景象，反映了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對生活、未來和前程的看法。1996到1998年，也就是何偉來北京之前，他在重慶的涪陵師範專科學校教英語。他的學生多是「70後」，都來自農村，畢業後將在更偏遠的鄉村教英語，他們的身份呈現着中國農村的歷史和現狀。何偉為這些鄉下孩子取了各式各樣的英文名字。其中，威廉出生於緊鄰鄧小平故鄉的四川雙龍公社第十大隊第三生產隊，可以看出，這是個用編號代替村名和行政單位的時代遺留(頁50)。威廉家是第三生產隊最富有的家庭之一，1982年成為這個生產隊第一個擁有電視的家庭。威廉還記得，電視買來了，十四吋大，都沒有人會開，但家裏已經聚集了一百來人。電視打開了，只有一個四川台，大家就看最流行的港劇《霍元甲》，那

維吾爾人波拉特的故事讓何偉認識到中國種族之複雜和幅員之遼闊，而波拉特的個人歷史和執著追求，讓我們看到一個小小份子如何從一個龐大的民族國家中出走，令人深思。

首主題曲整天在村裏縈繞。今天的國人也一定還有印象：

昏睡百年，睡獅漸已醒。

睜開眼吧，小心看吧，哪個願臣虜自認。

歷來強盜要侵入，最終必送命！

後來電視不知甚麼地方出了問題，有時沒了聲音，有時圖像很不清晰，他就握住天線。沒想到這招很管用，於是大家輪流握，這樣就能繼續看電視了（頁54）。讀到這裏，今天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一定會會心一笑，那時家裏添置電視的人大都有過類似的體驗，這個場景太逼真、太可愛了。

威廉和女友南西在艱難求職的過程中堅定了他們的愛情，他們輾轉求生活見證了溫州的發展；他們先同居後結婚，用年輕人的實用主義打敗傳統生活方式（頁512）。另一位女學生艾蜜莉喜愛思考，她抵制深圳又不得不在這喧鬧都市中定

位自己的生活。她和何偉一起收聽《夜空不寂寞》廣播節目，探討「白領」與「藍領」階級的不同（頁178）。雖然年輕人面對生活要有很多妥協、很多屈服，但是何偉看到，他們具有努力向上的勁頭，他們仍然在乎對與錯，這是最重要的。

何偉對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民文化和民眾生活也表現出很大興趣。比如他對北京雅寶路商貿區的描寫，見證了這個特定時代繁盛的大型商貿市場的衰落。即便是現在北京的「70後」，恐怕都快要遺忘從東二環到日壇公園的雅寶路一帶那個熙熙攘攘、讓人意興盎然的淘貨好去處了。

雅寶路市場的興起，根本上是得益於改革開放政策。國門打開，人們的生活欲望逐漸復蘇。這一帶是使館區，北京沒有一個地方像這裏有着價格便宜、品種繁多的各式商品，它從外貿地攤一天天發展壯大。自1980年代以來，這裏逐漸成為中國對中亞貿易的窗口，也是

何偉對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民文化和民眾生活表現出很大興趣。他對北京雅寶路商貿區的描寫，見證了這個特定時代繁盛的大型商貿市場的衰落。即便是現在北京的「70後」，恐怕都快要遺忘這個好去處了。



雅寶路一角

普通百姓逛街淘貨的首選之地，其商品吸引力遠在後來的秀水街之上。雅寶路走向繁盛並持續了十多年。不久，何偉回到美國後，發現他和終於來到美國的朋友波拉特竟然穿的是同樣牌子、樣式的襯衫，同樣來自雅寶路(頁276)！何偉不知道的是，後來在政府的整頓下，小攤被取締，建立起大商廈，有了嚴格管理後反而失去了當初的魅力。雅寶路令人遺憾地衰落了。

何偉在北京時恰好目睹了法輪功信眾遊行，這個事件自然也成為他關注的問題。對於法輪功的興起，何偉認為是由於它的信仰簡單明確、修煉方式易於操作，符合民眾對傳統呼吸靜坐的氣功的興趣。從大環境來說，民眾疲於應付改革開放的急速節奏，需要一個舒緩的生活方式。法輪功的興起是由於信眾發現聚集起來可以有效表達對批評者的反抗，於是日益組織起來；它被壓制是因為這種組織聚集力量被當局認為越過了不可逾越的底線，於是遭到禁止。但是遊行和禁止的方式，在何偉看來像是一場「慢動作的追逐」——「沒有受過教育的年輕男人追逐着沒有安全保障的老女人。」他認為殘酷且悲哀的是，我們知道應該支持哪一方，但也知道這種較量沒有贏家(頁238)。

何偉對中國人的思想世界有一個看法，他認為現在中國人信奉的是兩種不完整的信仰：唯物主義和民族主義。他覺得前者表現為中國人的實用主義，後者則體現在何偉對中國體育文化的分析考察之中。以中國申辦奧運為例，在他看來，中國從自己的運動傳統全盤轉移到

西方的運動傳統，學到的是西方體育中最愚蠢的特色——競爭意識和民族主義，遺漏了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他舉例說，從孩提時候起，教他運動的是父親而不是體育學校，父親教給他最重要的一課是：「有風度的輸，勝過不惜一切代價的贏。」(頁314)何偉還學到了中共政權和國際奧委會之間的相似之處：二者的組成原則和結構一樣，都是在一連串同心圓的基礎上建立，沒有民主選舉或派別，要做的只能是進入領導階層的內部(頁321)。

何偉認為，中國官僚體制對文化的壓制，造成一種強勢和蠻橫政治觀之下的文化感，文化意識卻正在喪失。何偉在北京創立了一個正式的《紐約客》(*The New Yorker*)辦事處，並向中方外交部提出申請。眾所周知，在全世界華人地區這本雜誌的中文名都是「紐約客」，而外交部卻決定直譯為「紐約人」。幾番交涉，何偉得到的是官僚式的拒絕。最終辦事處有了鮮紅的印章：「美國紐約人」，何偉的名片也印成「紐約人 何偉」。這個故事成為何偉的朋友捧腹大笑的談資(頁365)。他無意中參觀了一次北京郊區一個村莊的民主選舉，最終被驅逐，懊喪離去(頁331)。他還和影星、導演姜文打過交道，了解一些中國電影審查方面的情況。他認為，現在這個黨政權愈來愈走向「有權無威」的境地(頁420-21)。

在《甲骨文》中，何偉引用了清代學者劉鶚的一段話：「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國家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頁169)何偉是一個優秀的

何偉是一個優秀的觀察者和體驗者。作為一個對「中國」定義沒有任何預設心理的外國人，他有身在其中的理解，也有旁觀者的批評。這種感情是同情的也是審視的，是睿智的也是友好的。

觀察者和體驗者。作為一個對「中國」定義沒有任何預設心理的外國人，他有身在其中的理解，也有旁觀者的批評。這種感情是同情的也是審視的，是睿智的也是友好的。

三 陳夢家：結尾與隱喻

陳夢家——《甲骨文》的靈魂人物，很多書評甚至把他當做此書的主人公——在此著近半的第262頁方才登場。這既是一種不露痕迹的、精美的鋪陳方式，又是何偉在北京生活的自然發展。

說來真是巧，何偉在北京後海附近覓摸租房的過程中，偶遇一位八二高齡、身體硬朗，正在對抗強拆胡同的老人趙景心，最後抵抗以失敗告終：趙老眼睜睜看着他生活了近半個世紀的家被警察、便衣警員、警用塑膠帶、電視記者包圍起來，最後到來的是工人（頁222）。何偉了解到，趙老的父親是擁有普林斯頓神學院榮譽博士學位的神學家，趙家孩子從小接受中英文雙語教育，趙老所居住的兩座四合院中，東廂房住着的是他的姐姐，英文名露西，中文名叫趙蘿蕙（頁209）。不過，何偉當時並不知道此中關係，直到他讀到巫寧坤的《一滴淚》，方才恍然大悟，露西就是陳夢家的遺孀，那位在四合院東廂房翻譯《草葉集》（*Leaves of Grass*）的女性。1950年代趙蘿蕙幫助巫寧坤返國，《一滴淚》寫了巫寧坤與陳夢家夫婦的交往（頁268）。

何偉跟陳夢家的「結交」來自在安陽採訪時無意中接觸了一部厚

重的舊書——《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陳夢家是它的作者。書名當然不是陳夢家所取，由於眾所周知的時代原因，等到用這個書名時，陳夢家的名字已經不能出現在著作上。就是這本書帶出了一位深深掩埋於「甲骨文」中的歷史學家、靈魂人物，帶出了讀者對中國千年歷史和現實的唱嘆。

現在較少見到對陳夢家性格的描述，在巫寧坤的《一滴淚》中有一些描寫。《甲骨文》也有一些描寫，1950年代初期陳夢家夫婦正在清華和燕京大學任教，家住朗潤園。當局宣布學校職員和學生每天都要做集體體操時，陳夢家一邊在地板上繞圈踱步，一邊大聲抱怨：「這簡直就是《一九八四》成真，未免也太快了！」（頁268）

要寫陳夢家，何偉必然要訪問中國考古學的權威人物、陳的學生李學勤。很多書評都濃墨重彩《甲骨文》中李學勤在文革時對乃師的批判和他在採訪中表現出的悔意。不錯，何偉這段描寫引人入勝，李教授面對何偉訪問表現出的坦誠、矛盾、驕傲、恍然、自責、迴避等微妙情緒躍然紙上（頁471-75），把學術與時代的複雜糾葛層層剝開，把人性的複雜與復歸呈現於讀者眼前。

那麼，追尋陳夢家的意義在哪裏呢？從一開始，何偉就清楚這是一個已逝的故事。二十世紀的精英已經雨打風吹去了，他們與中國未來的關係實在有點遙遠。但是正是追尋的過程，讓何偉深深敬佩存活下來的人。他們接續了那個離亂年代精英的理想主義火花，他們在乎是非和對錯。

甲骨文、陳夢家都是一個當代中國的文化隱喻，折射了中國文化的源頭和走向。陳夢家通過甲骨文重構了商人的世界；何偉則通過追索從甲骨文時期直到當下的社會現況試圖重構當代中國人的生活。

甲骨文、陳夢家都是一個當代中國的文化隱喻，折射了中國文化的源頭和走向。陳夢家通過甲骨文重構了商人的世界；何偉則通過追索從甲骨文時期直到當下的社會現況試圖重構當代中國人的生活。

何偉依據著名社會經濟學家伊懋可 (Mark Elvin) 提出的「高級平衡的陷阱」這一經典概念，認為中國文化早期成功和後來走下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地理位置的孤立。如果對比東西方來看，他採訪過的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教授吉德煒 (David N. Keightley) 認為，中國歷史與西方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面向「過去」的祖先崇拜觀念，這讓民眾不能形成對祖先挑戰的懷疑精神，因而走向一種保守的文化 (頁 300、301)。何偉也覺得中國人的歷史觀限制了他們對歷史的重新詮釋，加之近代以來的遭遇，使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可避免地對西方價值和觀念產生興趣，並努力把它們融入到中國文化中，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嘗試。何偉認為這是一種「痛苦又笨拙的過程」，結果卻是「無可避免地抓住了西方最糟糕的一些思想」 (頁 301)。

或許可以這樣說，一個國家的歷史長度不能單純以時間跨度來衡量，而應以影響或存留於當下的政治架構及「活的歷史」來衡量。從這個角度看，現代文明因子有多少真正存在於今天的中國，令人思考；而當下中國的政治文化架構形成不過半個多世紀，它如何持續，如何發展進步，也是未知。所以，「甲骨文」這個神秘的隱喻或許象徵着歷史的有解與無解、尺短與寸

長，也透露着當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茫然。每個人在當下都是用自己的方式處理回憶，過去就是這樣緊貼着我們。

註釋

① 王海龍：〈導讀一〉、〈導讀二〉，載吉爾茲 (Clifford Geertz) 著，王海龍、張家瑄譯：《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頁 11、59。

② 參見孔飛力 (Philip A. Kuhn) 著，陳兼、劉昶譯：《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這部歷史學經典著作講的是清乾隆三十三年 (1768)，民間一種名「叫魂」的妖術蔓延籠罩全國，據說術士通過作法於受害者的名字、毛髮或衣物等，便可使其發病，以偷取其靈魂精氣為己服務。這種恐怖氣氛影響了從販夫走卒到帝王皇室的生活，全國上下官員和百姓都被動員捉妖，整個國家籠罩在不安和混亂氣氛中。但是經過一番無謂的折騰，產生了不少冤案，白白丟了些小民賤命和官員烏紗，最後只能不了了之。筆者讚賞這部研究深刻揭示了中國政治文化的本質：所謂傳統王朝「盛世」其實也是無理性的混沌政治。自中國文明時代以來，由於政治制度根本在人治，無形中增大社會運行成本，故始終未能建成簡潔、良好、理性的政治文化。

③ 海斯勒 (Peter Hessler) 著，李雪順譯：《尋路中國——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④ 海斯勒 (Peter Hessler) 著，李雪順譯：《江城》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一個國家的歷史長度不能單純以時間跨度來衡量，而應以影響或存留於當下的政治架構及「活的歷史」來衡量。「甲骨文」這個神秘的隱喻或許象徵着歷史的有解與無解、尺短與寸長，也透露着當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茫然。